

西江流域的铜鼓文化

陈洪波 赵腾宇 著



科学出版社

西江流域的铜鼓文化

陈洪波 赵腾宇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铜鼓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文物，西江流域是铜鼓的重要分布区。两千多年以来，西江流域的铜鼓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区域传统，成为瓯骆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之一。本书对于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来源与特点、社会文化功能、铸造技术、与周边区域铜鼓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同时还进一步对铜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策略提出了建议。

本书适合考古专业及相关专业高等院校学生、研究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江流域的铜鼓文化 / 陈洪波, 赵腾宇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03-060333-3

I. ①西… II. ①陈… ②赵… III. ①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研究 IV. ①K8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8174 号

责任编辑: 赵 越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2

字数: 250 000

定价: 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建设成果
广西师范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科研成果

前 言

铜鼓是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青铜重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7 世纪，沿用至今已有 2600 多年的历史。铜鼓使用的地理范围很大，广泛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重庆、海南等 8 个省份，以及泰国、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铜鼓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民族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与政治、经济和生活习俗紧密相连，创造了灿烂的铜鼓文化。铜鼓和铜鼓文化是这一地区从事稻作生产的各民族 2600 多年来社会发展、文明交往无法磨灭的记忆，也是这一地区各民族积极进取、繁衍生息的生动体现，蕴含着这些稻作民族对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朴素思考，表达了该地区稻作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观。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国内外学术界都对铜鼓和铜鼓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铜鼓起源、分类、传播、社会功能、族属等方面的研究，中外学术界成果斐然。历来在铜鼓研究上多为专题性研究或全局性研究，在研究范围也多采用国别或行政区划，从流域视角观察者较少。实际上，西江流域虽然不是铜鼓最早的发源地，但却是后来铜鼓文化的中心之一。这里的民族接受了外来的铜鼓文化，发扬光大，创造了铜鼓的多个重要类型，颇具区域特征。故而将西江流域作为一个单独区域来观察铜鼓文化的发展流变，在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上都具有学术依据。

西江流域面积广大，地理位置特殊，流域范围内的铜鼓类型包含了除遵义型、西盟型以外的六大类型，可以说是铜鼓文化传播发展的中心地带，是铜鼓文化由云南中西部向东传播之后的“第二次革命”，繁荣程度比起铜鼓文化的原生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结合文献资料、相关考古发现及西江流域地区各省市铜鼓文化的保存现状，力求还原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面貌，为当代学术界研究西江流域铜鼓文化提供一些初步参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大量从古至今流传下来铜鼓被毁坏，以铜鼓为载体的铜鼓文化也几近消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文化

软实力的建设也日益受到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时代主题。铜鼓文化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近 20 年来，虽然以壮族为代表的一些民族恢复了使用铜鼓的习俗，但是我们看到，与历史上繁盛时期的铜鼓文化相比，现在使用铜鼓的地域范围小、人数少，大量相关的舞蹈、歌谣、技艺等濒临消亡。为保持文化多样性，复兴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与传承铜鼓文化十分重要。

国内外对于铜鼓的研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虽然以西江流域为视角的研究较少，但是由于西江流域是铜鼓文化的中心区域，所以与之相关的成果十分丰富。现就国内外关于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绍。

国外学者对于铜鼓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特别是对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断代、族属、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884 年，德国德累斯顿枢密官、考古学家 A. B. 迈尔（A. B. Meyer）发表了《东印度群岛的古代遗物》，介绍了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在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出土的铜鼓，将巴达维亚铜鼓的图片和留存欧洲的铜鼓资料一起发表，为以后欧洲兴起的“铜鼓热”开了先河。1897 年，A. B. 迈尔和他的助手 W. 夫瓦（W. Foy）又搜集东印度群岛出土的铜鼓和流散在欧洲的中国铜鼓进行对比研究，完成了《东南亚的青铜鼓》一书。1898 年，荷兰汉学家狄葛乐（J. J. M. de Groot）以《东南亚的青铜鼓》一书为基础，发表了《东印度群岛及东南亚大陆铜鼓考》一书。狄葛乐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对铜鼓来源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看法，纠正了德国汉学家夏德（Frederick Hirth）认为铜鼓是马援或诸葛亮所创的观点，第一次证明铜鼓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作品，而且认识到铜鼓是权力的象征。

经过 19 世纪末的广泛讨论之后，20 世纪初诞生了一部铜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902 年，奥地利维也纳帝国和皇家博物馆人类学和民族学部的负责人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出版了他的德文名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在这本书中，作者对 165 面铜鼓实物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包括它们的尺寸、重量、花纹、铭文、形态等，并将这些铜鼓划分为 4 个主要类型和 3 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地区、铸造年代和反映的文化内容。他明确地把铜鼓的起源与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部落相联系，否定了马援和诸葛亮发明铜鼓的说法。这部书是 20 世纪初西方学者研究铜鼓的经典之作，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近一个世纪以来，铜鼓研究界基本上遵循他的分析框架，并以新的发现和新的成果不断充实和阐发他的观点。

黑格尔之后，铜鼓研究仍然长盛不衰，新的资料和论著不断出现，有关铜鼓的起源、族属、功用等方面，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一战后，研究铜鼓的

西方学者主要集中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法语：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 EFEO，越南语：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这里也成为世界铜鼓研究的重要基地。1918 年法国学者 H. 巴门特尔（H. Parmentier）最先发表《古代青铜鼓》一文，他于黑格尔著作之外，追加漏载的铜鼓 23 面，并将搜集到的 122 面铜鼓资料，按黑格尔的分类法作了分类。其后法国人 V. 戈鹭波（V. Goloubew）在 1929 年和 1932 年相继发表了《东京及安南北部青铜器的年代》和《关于金属鼓的起源和流布》两篇文章，根据越南东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确定东山铜鼓（黑格尔 I 型）的年代为公元 1 世纪中后期，对铜鼓铸造的年代和铜鼓铸造工艺的来源做出新的解释。1932 年奥地利学者 H·戈尔登（R. Heine-Geldern）发表的《远古印度支那金属鼓的意义及其由来》一文，大体同意戈鹭波关于玉缕铜鼓上的图案是表示死者祭祀仪式的说法。他认为，铜鼓是东南亚各民族普遍存在的宝物之一，其用途不仅限于葬仪和祭祀祖先，唯因为其贵重，才被用来给死者殉葬。此后巴门特尔、高本汉（B. Karlgren）、盖埃勒（U. Gueler）、来维（Paul Levy）等人，也发表了不少研究铜鼓的文章。但关于铜鼓的起源仍争议纷纷，他们只知道公元前后中国南方确已使用铜鼓，铜鼓不会是马援、诸葛亮创制的，但到底是出自汉民族之手还是少数民族之手，仍无定说。

日本是铜鼓研究的重要国家，对于铜鼓的研究开展也比较早。早期比较著名的学者有鸟居龙藏、松崎益城等人，其中鸟居龙藏曾在 1902 年到中国贵州等地考察，并将搜集到的铜鼓带回日本，后发表了《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一文，收录于《鸟居龙藏全集》中。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发表了一批重要的铜鼓研究论文，包括原田淑人《有关铜鼓制作年代的考察》（1937 年）、日野岩《关于马来联邦巴生出土的铜鼓》（1958 年）、市川健二郎《青铜鼓的起源》（1958 年）、冈崎敬《石寨山遗迹与铜鼓问题》（1962 年）、梅原末治《南亚的铜鼓》（1962 年）、松本信广《古代稻作民族宗教思想之研究——通过古铜鼓纹饰所见》（1965 年）等。这些论文主要依靠西方学者发表的资料和越南博物馆的实物进行研究，内容涉及铜鼓的起源、分布、年代、使用民族、纹饰及铸造工艺等问题。在铜鼓分类上，日本学者基本上沿袭黑格尔的体系，研究水平没有超过西方学者。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学者重新有机会可以到中国南方诸省开展田野调查、学术交流等活动。东京大学今村启尔发表的《古式铜鼓的变迁和起源》一文，以前人积累的数据为基础，运用日本考古学所擅长的器物类型研究，梳理了古代铜鼓系列发展的过程，并对早期铜鼓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

1973年以来,今村启尔教授和鹿儿岛大学的新田荣治教授对东南亚铜鼓进行了一些调查,对黑格尔的分类进行了一些修正,发表了诸如《论黑格尔I式铜鼓的二个系统》等文章,但未涉及铜鼓文化方面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同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学者合作,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也涌现出了吉开将人等新一代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对早期铜鼓的研究,确定了黑格尔分类之外有一个比黑格尔I型铜鼓更为原始的类型,即先黑格尔I型;二是在铜鼓分类中,明确提出同一时代同一类型铜鼓中有东、西两个系统,把黑格尔I型区分出石寨山系和东山系,将黑格尔I型中期和晚期(冷水冲型)鼓,分成东组(邕江式和浔江式)和西组(红河式),对黑格尔II型鼓,除了分出东(北流型)、西(灵山型)两组外,主张把越南的II型鼓另辟一型,命名为“类黑格尔II型”等。

2004年,在第49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作为区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研讨会上,吉开将人提交了学术综述论文《日本学者研究铜鼓的百年回顾》,梳理了百年来日本铜鼓研究的脉络。日本学者作为有别于中国和越南的第三国学者,可谓旁观者清,可以更客观地把握中国和越南两国的研究动向,避免因铜鼓而引发的各种“民族主义”倾向。

除了中国之外,越南是古代铜鼓分布最集中的国家之一,铜鼓研究自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也颇为丰硕。越南在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铜鼓研究主要控制在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者手里。待到1954年越南恢复和平后,越南学者才有了研究铜鼓的自主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越南学者开始发表研究铜鼓的论文。1956年,陈文甲发表了《铜鼓与越南奴隶占有制》一文,这是越南学者研究铜鼓的第一篇论文。陈文甲认为越南铜鼓是本国独有的制品,但冶铜技术和铜鼓铸造技术受到中国的影响。1957年,陶维英的《铜鼓文化和骆越铜鼓》提出越南铜鼓是骆越人传入的,铜鼓是骆越的创造物。这一观点在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一书中再度提及,他将当时越南河内博物馆收藏的9面黑格尔I式铜鼓称为“骆越铜鼓”,并认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方,骆越人是铜鼓的创造者。20世纪60年代初,越南学术界发表了多篇研究铜鼓的论文,如《关于古代铜鼓起源的探讨》等。这些文章当中,有些认为越南北部是古代铜鼓的故乡,也有些认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和中国云南。1963年还出版了黎文兰、阮文陞、阮灵合著的《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越南境内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遗物,对越南的黑格尔I型铜鼓进行了分期和排队,并推测了相对年代。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70年代,铜鼓研究成为越南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点课题,当局

发动了几乎所有能撰写铜鼓论文的学者研究铜鼓，越南《考古学》杂志在 1974 年连续推出两期铜鼓研究专辑，发表了 30 位学者的 29 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论述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年代和装饰艺术之外，还探讨了铜鼓的合金成分、铸造技术和用途，研究对象除了黑格尔 I 型之外，也延伸到了黑格尔 II 型、IV 型铜鼓。1975 年，越南历史博物馆出版了阮文煊、黄荣编著的《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一书，逐一介绍了在越南境内发现的 52 面东山型铜鼓（其中有 1 面是中国出土的开化鼓），对这些铜鼓进行了分类，推断了年代，对铜鼓的起源、分布、装饰艺术、用途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本书可以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铜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越南学术界关于铜鼓的基本观点。该书反复强调越南的东山铜鼓（或称骆越铜鼓）是黑格尔 I 型铜鼓中年代最早、造型和装饰艺术最精美的铜鼓，越南是这类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密的地区，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这类观点。1987 年，由范明玄、阮文煊、郑生编著的《东山铜鼓》一书由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他们认为属于东山型（黑格尔 I 型）的铜鼓作了全面报道，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发现的 148 面铜鼓和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发现的 55 面类似铜鼓。此书重新考察了以前所有的分类方法，并在对所有东山铜鼓作了详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法，将东山型铜鼓划分为 5 组 22 式。1990 年，越南考古研究院的学者们共同编著了《越南的东山鼓》一书，该书以清晰的照片和描绘细致的线图逐一展示了在越南境内发现的 115 面东山铜鼓和在中国云南出土的 3 面铜鼓，以及奥地利维也纳收藏的 1 面“东山铜鼓”，并按其年代先后分成 5 组。《东山铜鼓》和《越南的东山鼓》这两本图集的分类是相同的，都认为越南的玉缕鼓、黄下鼓是最古老的铜鼓，都把中国云南和其他地方（包括越南老街）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列为 D 组，排在冷水冲型（C 组）之后、遵义型（E 组）之前，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普遍的排列次序相矛盾。

2001 年，越南黄春征教授提出了 4 型 4 式的分类方法。2011 年，为了更好地研究越南铜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三家机构共同编写了《越南铜鼓》一书。该书收录了 126 面各类型的越南古代铜鼓，图文并茂地呈现了这些铜鼓的来源、规格、重量、纹饰等信息，分析了越南铜鼓的发展历史，探讨了其制作工艺。这部著作作为了解越南铜鼓文化，及其与中国等地区的铜鼓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关于铜鼓的文献记载也最为丰富。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文人学者就注意搜集和研究铜鼓了。唐宋以来，流寓南方边陲的文人学者，有的听到过关于铜鼓的传闻，

有的则亲眼见过铜鼓，出于猎奇，他们把铜鼓写入诗文，但是基本上只是作客观描述，还谈不上什么研究。在一些金石学和地方史志著作中，也散见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后汉书》关于马援和骆越铜鼓的记述流传最广，最为有名。此后，提到铜鼓的著作还有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清代开始，《西清古鉴》《西清续鉴》《陶斋吉金录》《金石索》等金石学著作关于铜鼓来源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编纂《西清古鉴》大型文物图集时，收入14面铜鼓，并在第一面鼓之后注明“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而流传于百粤群峒者则皆伏波为之”，多少有了一点分类的萌芽，体现出对铜鼓形制的复杂性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西清续鉴》甲、乙编，又收进铜鼓9面。这两部书，是铜鼓见于图录之始，也是中国学者真正研究铜鼓实物的开端。除此之外，地方史志也对铜鼓有较多的记述，例如清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在编修《广西通志》时作《铜鼓考》，搜集了大量铜鼓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也就在这时，有关铜鼓的诗词哄然而起，洋洋洒洒到处唱和，但这些诗词多为借物咏志之作，对铜鼓本身并无多少学术见解。此期间，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也常有关于铜鼓的记载，为以后研究铜鼓的分布、收藏和流传留下许多宝贵资料。虽然这些地方史志中的很多内容是作者穿凿附会，但是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清代中晚期，受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国内文人学者对铜鼓的研究开始脱离神话传说向考释发展。例如道光年间，罗士琳著《晋义熙铜鼓考》，对有“义熙”铭文的一面铜鼓作了精辟的考释。

20世纪30年代，正当西方学术界在为铜鼓的起源、族属等问题争论不休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铜鼓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33年，广西学者刘锡蕃将他在苗山见到铜鼓的经历写入《岭表纪蛮》一书；唐兆民对广西博物馆收藏的20多面铜鼓进行了实测绘图，着手编著广西铜鼓图录；1936年，上海博物馆郑师许出版了《铜鼓考略》一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学者研究铜鼓的成果，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38年冬，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专辟《铜鼓研究》一章，讨论铜鼓的起源、创始铜鼓的民族、铜鼓的用途等。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一些报刊，如《大公报》《太白半月刊》《旅行杂志》等，也发表过一些谈论铜鼓的文章。这时期中国南方修纂的地方志，都收录了当地发现、收藏和使用铜鼓的情况，记录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中国学者研究铜鼓在古代文献资源方面的案件是得天独厚的，在接触铜鼓实物和体察铜鼓习俗方面也较便利，但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还相当落后，因此，研究成果并不显著。

1949年后，中央和各省、市相继建立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机构，对铜鼓的搜

集、整理、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很快使铜鼓资料的积累成倍增长，关心和研究铜鼓的人越来越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逐步摆脱了落后面貌，迈向与铜鼓文化遗产大国相称的世界一流水平。

1954年，四川大学闻宥编著了《古铜鼓图录》一书，该书是我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铜鼓并正式出版图录的开端。闻宥在书中将铜鼓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并把这三种类型归为东、西两式，同时他还对铜鼓纹饰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接着云南省博物馆也编辑出版了《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为铜鼓研究增加了一批资料。1955年5月，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石寨山遗址甲区1号墓挖掘出一面铜鼓和两面铜鼓形贮贝器。这是第一次由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铜鼓，使我国学者第一次有条件使用第一手考古数据对铜鼓进行研究。这一时期西南和华南地区大量的古代墓葬被发现并进行了科学发掘，除了上面提到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还有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西林普驮铜鼓墓等，这些墓葬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有确切断代的铜鼓实物，为我国铜鼓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我国铜鼓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众多学者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其中重要者如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黄增庆《广西古代铜鼓初探》、洪声《广西古代铜鼓研究》、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等。这些论著从铜鼓的断代、分类、纹饰、族属等方面对中国古代铜鼓作了系统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随着铜鼓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迫在眉睫。1980年4月，由中国民族学会、文物出版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发起，在广西南宁举行了第一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会后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其后，还召开了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和四次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均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成果丰硕。1988年，由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出版，该书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以全国收藏的1400多面铜鼓实物及其考古学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系统介绍了古代铜鼓的发现、起源、类型、年代、族属、用途、纹饰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铜鼓研究开始涉及科技领域，物理、化学等技术纷纷用于铜鼓研究中。1982年，北京钢铁大学（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92面铜鼓进行了测量分析，基本弄清楚了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流程。随后，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上海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南宁重

型机器厂，根据北京钢铁大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铜鼓王”的复制。1992年，万辅彬从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入手，考证铜鼓的铸造工艺和铜鼓的声学方面的内容，总结多年来他们运用科技手段研究铜鼓所取得的成果，形成了《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一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新世纪开始，国内铜鼓学术界在几十年来对铜鼓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关注起传世铜鼓及铜鼓文化的调查，并积极倡导对铜鼓文化的普及、宣传、保护等，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例如2007年，蒋廷瑜等编著的《铜鼓文化》一书，对铜鼓文化的起源、类型、传播、分布、艺术特征、内涵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是一部较为完整地介绍铜鼓文化的专著。关于铜鼓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相继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及专著。例如高艳玲《对广西铜鼓文化的开发式保护思考》、万辅彬《关于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的思考》、韦丹凤《广西活态铜鼓文化研究》等。2013年，由多位学者共同编著的《大器铜鼓》一书出版，这本书从铜鼓的学术研究出发，将铜鼓文化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去，提出了铜鼓文化保护、传承与实践的具体措施，为发掘、抢救、保护、传承铜鼓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大陆学者外，台湾、香港学者也不断有研究铜鼓的论著发表。如凌纯声《记本校二铜鼓兼论铜鼓的起源及其分布》（1950年）、《东南亚铜鼓纹饰新解》（1955年）、罗香林《越人铜鼓：它们的制造和用途》（1967年）、徐松石《百粤雄风，岭南铜鼓》（1974年），分别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角度探索铜鼓的奥秘，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目 录

第一章 西江流域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概述·····	(1)
第一节 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 ·····	(1)
第二节 西江流域的社会历史 ·····	(2)
第二章 铜鼓的起源与传播·····	(7)
第一节 铜鼓的起源 ·····	(7)
第二节 铜鼓的发展阶段 ·····	(13)
第三节 铜鼓在西江流域的传播 ·····	(14)
第三章 西江流域各类型铜鼓综合研究·····	(36)
第一节 西江流域各类型铜鼓的特点 ·····	(36)
第二节 西江流域各类型铜鼓的族属 ·····	(40)
第三节 中原文化对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影响 ·····	(46)
第四章 西江流域与周边地区铜鼓文化的关系·····	(49)
第一节 与贵州地区的关系 ·····	(49)
第二节 与越南北部地区的关系 ·····	(55)
第三节 西江流域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铜鼓文化圈中的地位 ·····	(70)
第五章 比较视野下的西江流域铜鼓社会文化功能·····	(73)
第一节 西江流域铜鼓的社会文化功能 ·····	(73)
第二节 中原地区铜鼎的社会文化功能 ·····	(81)
第三节 铜鼓与铜鼎的社会文化功能比较 ·····	(84)
第六章 西江流域铜鼓的纹饰·····	(87)
第一节 铜鼓纹饰的文化内涵 ·····	(87)
第二节 太阳纹 ·····	(88)
第三节 翔鹭纹 ·····	(91)

第四节	羽人纹	(94)
第五节	船纹	(96)
第六节	蛙饰和蛙纹	(99)
第七节	其他纹饰	(105)
第七章	铜鼓铸造技术	(110)
第一节	铜鼓铸造技艺研究综述	(110)
第二节	铜鼓的合金成分和矿料来源	(112)
第三节	铜鼓的铸造地点	(115)
第四节	铜鼓的铸造方法	(119)
第五节	铜鼓铸造技术的复原推动文化传承	(122)
第八章	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124)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关于非遗保护的 effort	(124)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西江流域铜鼓文化保护的作用	(126)
第三节	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的保存现状——以广西为例	(127)
第四节	广西复兴铜鼓文化的努力	(130)
第五节	西江流域其他省份铜鼓文化的保护状况	(137)
第六节	西江流域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	(141)
第九章	结语	(150)
参考文献		(152)
附录		(157)
后记		(167)

第一章 西江流域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概述

铜鼓文化在西江流域的自主发展，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岭南地区的青铜技术和矿产资源为铜鼓铸造提供了物质基础，铜鼓本身的各种功能也非常切合岭南“酋邦”政体的需要，从而催生了铜鼓文化在西江流域的高度发展，而铜鼓文化本身也成长为岭南早期文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

西江为珠江的干流，全长 2214 千米，流域面积达 353120 平方千米，是仅次于长江、黄河的中国第三大河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东麓，流经云、贵、桂、粤，于广东的磨刀门注入南海。西江干流在不同区段有着不同的叫法，源头至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称南盘江，以下至广西象州县石龙镇称红水河，石龙镇至桂平市区称黔江，桂平市区至梧州市称浔江，梧州市至广东省三水县思贤滘称西江，再往下称为珠江。西江水系支流众多，河网密布，其中主要的有北盘江、柳江、左江、右江、红水河、黔江、桂江等。本书涉及的“西江流域”，其范围主要包括南盘江、红水河、右江、邕江、郁江、浔江等流域及两广交界之云开大山区。

西江流域地处中国南部，北回归线贯穿其中，属于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炎热多雨，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4 \sim 22^{\circ}\text{C}$ ，年平均降雨量 $1200 \sim 2200$ 毫米，但降水量地域分布和时间分配都不均衡，由东向西降水依次减少，并且每年 4 月至 9 月降水量最大，11 月至次年 3 月降水量最小。西江流域得益于丰富的降水和湿润的气候，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西江主要流经的云南、广西、广东是我国已发现植物种类数量最多的三个省份。除此之外，野生动物、水产渔业、金属矿物等资源的保有量也都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江流域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约占总面积的 90%，平原较少。西江流域上游属于云贵高原地带，故整个流域呈西高东低的走势。

由于西江流域良好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动植物矿物等资源，这一地区数十万

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继而在这里产生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即“那文化”。“那”即壮语中的稻田，那文化也就是岭南西部地区稻作农业民族的文化。那文化与铜鼓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铜鼓文化圈与稻作文化圈（那文化圈）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也就是说，稻作文化是铜鼓文化产生的人文背景和物质生活基础”^①。

第二节 西江流域的社会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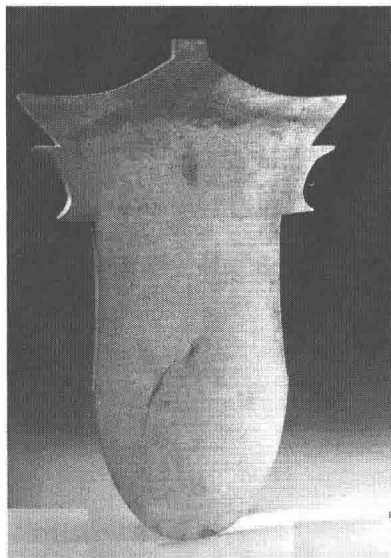
西江流域气候适宜，物产富饶，自古至今都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地区，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西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年代既早，又十分丰富和典型。最著名的是右江穿过的百色盆地，河流沿岸地区发现大量打制石器遗物和遗迹，测年数据为距今 80.3 万年。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江流域多个支流都已经有人类活动，目前在柳江、桂江、红水河、郁江、左江、右江等流域，已经发现约 20 处古代人类化石地点及文化遗存。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渔猎为生，利用天然洞穴栖息，使用的石器工具主要是利用河滩砾石打制而成。

到了距今 12000 年前后，西江流域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文化进一步繁荣。目前仅在广西境内就发现了 50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们仍然以渔猎采集为生，居住在洞穴里，但开始逐渐走向平原和河旁台地，所使用的石器工具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均有，但越是早期，打制石器所占比例越高，随着时代发展，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上升。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了制作十分粗糙的陶釜，这是中国最原始的陶容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南宁邕江两岸出现大批贝丘遗址，学术界称之为“顶蛳山文化”。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邕江支流八尺江畔，是一处大型贝丘遗址，经过了大规模的发掘，研究成果丰硕，文化特征具有代表性，故而此类遗址皆以顶蛳山文化命名之。这个时期先民们居住在河旁台地，构筑离地而居的干栏式木质房屋，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面积达到数千平方米规模的聚落。随着定居程度的增高，陶器技术有了高度发展，顶蛳山文化的陶器多种多样，功能齐全。新石器时代末期，

^① 万辅彬等：《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第 50 页。

稻作农业兴起，改变了西江流域长期以来的渔猎采集经济形态。以桂南左右江交汇处为中心，发现了大批的石铲遗存，考古学上称之为大石铲文化，这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稻作农业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据。石铲本是农业生产工具，随着农业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礼仪用具，用于祭祀活动（图一）。在稻作农业的经济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西江流域进入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古国时代。



图一 广西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出土大石铲（现藏广西博物馆）

距今 3500 年前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央王朝已经颇有来往，广西各地曾经发现不少制作精美的卣、匜、编钟、鼎、壶等礼器，具有中原风格，可能是来自中原王朝。与此同时，岭南地区也发展起来自己的青铜技术。在广西武鸣县马头古墓群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就是本地铸造青铜器的有力证据。在恭城、武鸣、平乐、宾阳、田东等地，发现有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一些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例如羊角纽铜钟（图二）、靴形钺、扁茎短剑、铜鼓等。特别是田东县锅盖岭墓葬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鼓，说明当时西江流域的骆越民族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这种青铜重器。这一时期的西江流域，社会发展已经从古国时代进入到方国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